

编年史关照下“归化”与“异化”策略选择的因素

王朝英

吉林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 2025年7月7日; 录用日期: 2025年8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5年8月28日

摘要

本文以编年史为脉络, 拟以时间为轴, 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时期, 系统梳理中西方翻译史上“归化”与“异化”策略的演变轨迹, 深入探讨不同历史时期译者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通过梳理古代佛经翻译、近代西学东渐、现代理论建构及当代全球化实践的演进轨迹, 结合具体译例与理论分析, 揭示出策略选择受社会权力结构、宗教传播需求、知识生产模式及译者主体性等多维因素制约。研究发现, 翻译策略从古代“形式忠实”向当代“功能对等”的转型, 本质是跨文化认知深化的体现。在“一带一路”等当代实践中, 策略融合需兼顾文化自信与受众接受, 为构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范式提供历史参照与理论启示。

关键词

归化与异化, 翻译策略选择, 编年史, 策略选择因素

Factors in the Selection of Domestication versus 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 under the Lens of Chronology

Chaoying Wang

Graduate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Jul. 7th, 2025; accepted: Aug. 15th, 2025; published: Aug. 28th, 2025

Abstract

The essay writer, based on chronology,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domestication versus 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 with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segmented into four distinct historical periods: ancient, early moder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onducting an in-depth exploration into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ranslator strategy selection across these diverse historical epoch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evolutionary paths from ancient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era, to moder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practices—alongside concrete translation example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this essay reveals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straints on strategy choice, including socio-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s, religious dissemination imperatives, mod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hift in translation strategy from an emphasis on “formal fidelity” in antiquity toward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contemporary practice is, at its core, a manifestation of deepened cross-cultural cognition. Within contemporary context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integration of strategies necessitates a dual consider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longside readability, thereby offering historical reference points and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 for Chinese discourse.

Keyword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Chronology, Factors of Strategy Selec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翻译活动的演进史。《历史上的译者》(*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深刻指出:“翻译活动的演变轨迹,不仅映射着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变迁,更镌刻着不同文明对话的权力图谱。”(Delisle & Woodsworth, 2012) [1]从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跨语转写,到当代神经网络翻译的实时转换,翻译始终作为文明对话的桥梁,其策略选择从未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作为应对文化差异的核心策略,由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于1813年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首次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后经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1995) [2]中赋予其文化批判维度,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范畴。前者指通过“透明化”翻译使译文迎合目标语文化,后者则刻意保留源语的异质性特征,二者的张力关系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中的互动模式。

文献综述

西方翻译理论对归化与异化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转向”(Bassnett & Lefevere, 1990) [3]。韦努蒂将翻译策略选择与文化权力关系相联结,通过对19世纪英美翻译实践的考察,指出归化策略往往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认知影响相关,而异化则体现了对这种影响的主动反思(Venuti, 1995) [2]。这一理论深受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纯语言”观的影响——翻译的使命“不是通顺,而是揭示语言间的互补性”(Benjamin, 2007) [4]。奈达(Eugene 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则从语言学视角出发,倡导以读者接受为导向的归化策略,强调“从语义到文体的最切近自然对等”,该理论在《圣经》翻译实践中得到充分应用,如将“洗礼”译为非洲部落的“浸水礼”,通过文化转译实现宗教传播效果最大化(Nida, 1964) [5]。

实际上,西方翻译史并非同质化整体,而是呈现出“异化-归化”多元并行的特征。古罗马时期,西

塞罗的“演说家式翻译”(归化)与斐洛的圣经“字字对译”(异化)的交锋,实质是“文化传播需求”与“宗教权威性维护”的矛盾体现(谭载喜, 1991) [6],而非简单的策略对立。到了法国古典主义时期,译者多雷在《论如何出色地翻译》中明确反对逐词对译,强调“意义对意义”的意译(归化倾向),这与当时法国对语言典雅性的追求直接相关。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施莱尔马赫提出“让读者靠近作者”,主张保留源语文化差异(异化倾向),其思想与19世纪德国民族语言建构需求深度绑定,体现了弱势文化通过异化策略抵御强势文化影响的认知自觉。可见,不同时期的策略选择与宗教传播、政治需求、文化追求等因素深度绑定。

中国译论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可追溯至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之争”。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归化倾向,而道安的“五失本”原则则奠定了异化理论的雏形(谭载喜, 1991) [6]。不过这一时期的争论并非“质派取胜”的线性结果,而是实践中“文质调和”的持续探索。道安虽强调“案本而传”(质,近异化),却因“秦人好文”不得不承认“非文不可”;鸠摩罗什虽被视为“文派”代表,但其“裁略原文”的同时仍坚持“因循本旨”,形成了“文质调和”的实践智慧。民国时期,翻译策略的争议演变为直译与意译之争。鲁迅的“硬译”(极端异化)与梁实秋的“宁顺而不信”(极端归化)构成光谱两端,而周作人“直译需达意”、曾孟朴“顺国性直译”等主张,则处于光谱中段,形成“绝对直译-灵活直译-绝对意译”的连续体。这种内部多样性表明,中国翻译思想始终在“求真”与“务实”的张力中动态平衡(王宏志, 2003) [7]。新千年以来,学界对归化与异化的认知逐渐超越语言层面,延伸至文化伦理领域:郭建中引入韦努蒂理论后,学界更清晰地认识到二者并非对立,而是“在语言、文化、伦理层面动态调适”的关系(郭建中, 2000) [8]。孙致礼通过对百年中国文学翻译的考察,提出“21世纪中国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的论断,认为文化自信的提升促使译者更注重源语文化特质的保留(孙致礼, 2002) [9]。谢天振的译介学理论将翻译策略选择置于文化权力关系中考察,指出“翻译策略是文化话语权博弈的动态结果”(谢天振, 2008) [10]。

然而,现有研究对中西方翻译史的策略演变缺乏系统性的编年史梳理,尤其在策略选择的因素分类上存在理论碎片化问题。本文旨在以编年史为经线,拟以时间为轴,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时期,以策略选择因素为纬线,结合具体译例与理论建构,构建多维度的因素分析模型,揭示策略选择与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

2. 古代翻译时期(公元前3世纪~15世纪): 宗教传播与强势文化影响下的策略萌芽

2.1. 西方: 古罗马文化吸纳与圣经翻译的策略博弈

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古罗马译者在翻译希腊典籍时普遍采用归化策略,形成“罗马翻译传统”的核心范式。西塞罗(Cicero)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宣称:“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翻译——保留思想形式,但用符合罗马表达习惯的语言”,其翻译的希腊哲学著作刻意将“φρόνησις”(实践智慧)译为“prudentia”(审慎),通过文化转译消解希腊文明的异质性。这种“演说家式翻译”与罗马帝国的文化整合需求密切相关:一方面,希腊文化的先进性促使罗马需通过翻译吸收其精华;另一方面,罗马作为政治军事强国,又试图通过语言改造确立自身文化主体性。这种双重性使得归化策略成为平衡文化吸纳与自我认同的工具,而非单纯的“强势文化主导”(Venuti, 1995) [2]。贺拉斯在《诗艺》中强化“创造性忠实”原则,要求“保留原作精神而非字句”,形成西方早期归化理论的核心范式。

4世纪至5世纪的圣经翻译呈现策略分化的复杂图景。哲罗姆(Jerome)在翻译《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时,创造性地采用“部分异化+部分归化”的复合策略:对“耶和华”等宗教术语保留希伯来语发音(Iehovah),对叙事文本则进行拉丁化句法改造。这种策略选择源于宗教文本的双重属性——既需保留神圣性(通过异化),又需争取拉丁读者(通过归化)。圣奥古斯丁(Augustine)在《论基督教教义》中进一步阐释:“翻译的真理是实质而非文字,如圣灵借译者之口言说”,为后世“意义优先”的归化传统奠定神

学基础(Augustine, 2012) [11]。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阿拉伯翻译运动(8~14 世纪)呈现独特的策略混合特征。巴格达智慧宫的译者对希腊哲学著作采用“注释式翻译”——核心术语异化保留(如“逻各斯”音译)，论证过程归化阐释，这种策略服务于伊斯兰教对异质文化的选择性吸收，体现了“真理超越语言”的宗教宽容精神(见表 1)。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during antiquity
表 1. 西方古代时期翻译策略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	代表译者/事件	策略倾向	核心影响因素	典型案例
古罗马时期(前 3C~5C)	西塞罗、贺拉斯	归化主导	帝国文化整合需求、希腊文化吸纳	西塞罗将希腊哲学概念罗马化
中世纪圣经翻译(4C~15C)	哲罗姆、奥古斯丁	异化与归化混合	宗教教义准确性、拉丁语读者接受度	哲罗姆对宗教术语的音译与文本归化处理

2.2. 中国：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与策略体系化

东汉至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争论以“文质之争”的形式展开，构成中国译论史上首次策略理论建构(马祖毅, 2006) [12]。支谦主张“文”，即归化译法，其译《维摩诘经》时“删雅古以适今时”，用道家“无”诠释佛教“空”(sūnyatā)，形成“格义”翻译法(谭载喜, 1991) [6]。这种策略的选择与佛教初入中土的传播需求直接相关：面对本土文化对异质宗教的排斥，通过借用道家概念可降低认知壁垒。道安则提倡“质”，即异化译法，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序》中提出“五失本”原则，强调“案梵文书，唯有言倒时从顺耳”，甚至不惜牺牲汉语表达习惯以保留梵文句法。这种分歧本质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文化适应与原典忠实的矛盾体现。

唐代玄奘将佛经翻译推向策略成熟期。他制定“五不翻”原则：对“秘密语”(如陀罗尼)、“含多义”(如薄伽梵)等五类术语坚持音译异化，对《大般若经》等文本的叙事部分则进行汉语文言化调整，形成“术语异化 + 文体归化”的策略模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其译场实行“证义 - 缀文 - 润色”三级审核制，这种制度化设计确保了策略的系统性实施。值得注意的是，玄奘的策略选择既出于佛教义理精确传播的需要，也得益于唐初“华夷兼蓄”的文化政策——太宗皇帝对译经的支持，使异化策略得以突破本土文化的抵抗(谭载喜, 1991) [6] (见表 2)。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ncient China
表 2. 中国古代时期翻译策略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	代表译者/事件	策略倾向	核心影响因素	典型案例
东汉至隋唐佛经翻译	支谦、道安	文质之争	佛教中国化需求、本土文化接受度	支谦用道家概念诠释佛教“空”的概念
唐代玄奘译经	玄奘	策略系统化	宗教义理精确性、唐初文化政策	“五不翻”原则与译场制度的建立

3. 近代翻译时期(16 世纪~19 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与启蒙思想的策略转型

3.1. 西方：宗教改革与民族语兴起的策略实践

16 世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翻译德语圣经时，推行彻底的归化策略，开创西方翻译史的新纪元。他刻意将“Brot”(面包)而非拉丁语“Panis”译经，使文本贴近民众生活，这种“地道德语”策略直接服务于宗教改革目标——通过语言归化瓦解拉丁语教会的文化主导地位。路德的翻译实践催生了“民众语

言神圣化”的认知革命，正如他在《论翻译》中所言：“翻译必须让母亲们听懂，让孩子们记住，让商贩们引用”(Luther, 1530) [13]。

18 世纪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在《论翻译的原则》中系统提出翻译三原则，强调“复现原作思想”“保持原作风格”“译文通顺”，本质上构建了“动态对等”的归化理论框架。该理论反映了启蒙时期理性主义对跨语言意义精准传递的追求，与同期德莱顿(John Dryden)的翻译三分法(逐字译、意译、拟作)形成理论呼应——德莱顿翻译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时，将拉丁六步格转为英语英雄双韵体，用“不列颠”暗喻“新罗马”，使归化策略成为民族认同建构的工具(Dryden, 1968) [14]。

19 世纪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异化理论标志着西方翻译思想的重要转折。他在 1813 年《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明确提出：“翻译要么让读者走向作者(异化)，要么让作者走向读者(归化)”，并批判德国译者过度归化法国文学，主张“保留外语的陌生感，如让读者在柏林街头遇见雅典哲人”(Schleiermacher, 2012) [15]。这种理论建构与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密切相关，体现了在法国文化强势影响下，德国通过强化文化异质性构建自身认同的努力(见表 3)。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early modern west
表 3. 西方近代时期翻译策略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	代表译者/事件	策略倾向	核心影响因素	典型案例
宗教改革时期(16C)	马丁·路德	归化主导	宗教改革诉求、民族语言兴起	德语圣经的通俗化翻译
启蒙运动时期(18C)	泰特勒、施莱尔马赫	归化理论深化与异化兴起	理性主义思潮、民族文化自觉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与施莱尔马赫二分法

3.2. 中国：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的策略调适

19 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时，采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深度归化策略，将赫胥黎“survival of the fittest”译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借用儒家“天演”概念包装进化论思想。这种策略选择受制于晚清士大夫“中体西用”的认知框架——通过文化归化降低新思想的接受阻力。严复在《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三原则，实则以“雅”(归化)统摄“信”，其翻译实践被钱钟书称为“化境”，即通过归化实现“思想的投胎转世”(钱钟书，1979) [16]。

林纾的文学翻译呈现“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混合特征。他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将法文小说转化为中国传统章回体，把“玛格丽特”译为“玛格利”以贴合汉语韵律，同时保留“俱乐部”等新术语的异化译法。这种策略混合既源于对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的迎合，也受限于其不通西文、依赖口述的翻译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林纾的“创造性归化”虽被批评为“讹译”，却意外成为晚清文学革新的催化剂，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谢天振，2008) [10]。

1919 年前后鲁迅提出“宁信而不顺”的异化主张，译苏联文学时保留“硬译”风格，甚至创造“奥伏赫变”(Aufheben)等异化术语。他在《“题未定”草》中强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旨在通过语言异化引入新思想，突破传统汉语表达的局限。这种策略选择与启蒙思想传播的诉求直接相关，反映了译者通过翻译重构民族认知方式的文化自觉(鲁迅，2005) [17] (见表 4)。

4. 现代翻译时期(20 世纪~21 世纪初)：理论建构与意识形态博弈

4.1. 西方：文化转向与后殖民理论的策略反叛

20 世纪 60 年代，奈达(Eugene Nida)提出“功能对等”理论，将德莱顿的意译传统现代化，主张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modern China
表 4. 中国近代时期翻译策略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	代表译者/事件	策略倾向	核心影响因素	典型案例
晚清西学翻译(19C 末)	严复、林纾	深度归化	救亡图存需求、士大夫认知框架	严复《天演论》的儒家概念借用
20 世纪初(1919 年前后)	鲁迅、林语堂	异化倡导与策略调和	启蒙思想、文化革新诉求	鲁迅“硬译”主张与林语堂跨文化调和实践

“译文读者的反应应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该理论在《圣经》翻译中表现为激进的归化策略——将“羔羊”(lamb)译为非洲部落的“小山羊”，通过文化转译实现福音的“本土化”。这种策略虽提升了传播效率，却引发学界对文化适应性边界的讨论：韦努蒂指出，过度归化可能导致源语文化特质的消解(Venuti, 1995) [2]。

90 年代韦努蒂的“异化伦理”理论呈现鲜明的反主流倾向。他在翻译德里达作品时刻意保留法语句法特征(如长句结构)，用“延异”(différance)等异化译法突出语言差异，这种“抵抗式翻译”理论直接呼应本雅明的“纯语言”观——“翻译的使命是揭示语言间的互补性”。值得注意的是，韦努蒂的理论建构与后殖民主义思潮同步，旨在通过翻译策略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惯性(Venuti, 1995) [2]。

4.2. 中国：文化主体意识与跨文化调和的策略探索

20 世纪 30~40 年代，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展现出策略选择的高超智慧。他对“二十四桥”等文化符号采用“Twenty-four Bridges”异化译法并加注释，对日常对话则进行归化口语处理，这种平衡源于他“跨文化调和者”的自我定位。在《论翻译》中，他提出“译者须为‘原作者之知己’”，主张“忠实非字字对译，乃精神贯通”，这种“动态忠实”观预示了后来霍尔姆斯的描写翻译研究路径(林语堂, 1932) [18]。

改革开放后，杨宪益、戴乃迭译《红楼梦》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构建了中国文学外译的经典范式。如“怡红院”译为“Happy Red Court”，既保留“红”的文化象征，又通过英语构词实现语义归化；“金陵十二钗”译为“Twelve Girls of Jinling”，通过异化译法保留中国文化特质。这种策略选择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提升后，译者对“中国话语国际表达”的探索，也验证了孙致礼“从归化趋向异化”的论断(孙致礼, 2002) [9]。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翻译策略逐渐呈现“异化增强、归化调适”的特征。在文学翻译领域，莫言作品的外译堪称典型——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翻译《红高粱家族》时，对“高粱酒”“土匪”等文化意象采用“gaoliang wine”“bandit”等异化译法，同时将方言俚语转化为符合英语读者习惯的口语表达，形成“文化符号异化 + 叙事逻辑归化”的混合策略。这种选择既源于对中国乡土文化独特性的尊重，也考虑到西方读者对东方叙事的认知阈值，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下译者对“传播效度”与“文化保真”的双重考量。

进入 21 世纪，典籍外译成为文化输出的核心载体。叶朗主编的《中国文化读本》英译本中，“龙”(dragon)的翻译引发策略争议：最终采用“loong”的异化新译法，既规避西方“dragon”的负面联想，又通过注释强化中华文化中“龙”的祥瑞内涵(叶朗, 朱良志, 2008) [19]。这种策略选择背后，是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不再被动接受目标语文化的认知框架，而是主动构建源语文化的阐释权(见表 5)。

Table 5.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Chinese-western modern era
表 5. 中西方现代时期翻译策略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	代表译者/事件	策略倾向	核心影响因素	典型案例
西方(20C)	奈达、韦努蒂	归化理论现代化与异化伦理建构	文化输出需求、后殖民反思	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与韦努蒂抵抗式翻译
中国(20C~21C 初)	杨宪益、许渊冲	策略多元化	文化“走出去”战略、译者主体性	《红楼梦》异化翻译与许渊冲“三美论”

5. 当代翻译时期(21 世纪以来)：技术驱动与全球化的策略融合

5.1. 全球化语境下的策略协同

在当代翻译理论中，“归化”与“异化”不再被视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个连续谱上的不同点。翻译实践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和受众需求，灵活选择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实现最佳的翻译效果。“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翻译实践形成“标识异化 + 阐释归化”的新型策略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译为“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既保留核心概念的文化标识，又通过英语复合词结构实现语义归化；“丝绸之路”译为“Silk Road”并附加历史背景说明，这种策略组合既服务于文化标识的国际传播，又考虑非汉语读者的认知需求。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翻译中，“小康社会”(Xiaokang Society)采用异化音译并附加“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的归化解释，体现了“文化自信”与“受众接受”的辩证统一(谢天振，2008) [10]。

在全球化语境下，译者应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根据文本类型灵活调配归化与异化策略——对于承载独特文化价值的文本，适度保留异质性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对于实用性文本，合理运用归化策略提升传播效率，最终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与有效沟通。例如，在翻译村上春树作品时，译者应保留“物哀”“侘寂”等日式美学概念的音译(“mono no aware”“wabi-sabi”)，并通过序言解读帮助读者理解其文化内涵。

5.2. 技术革新下的策略调适

神经网络机器翻译(NMT)的兴起深刻改变了策略实施方式。谷歌翻译处理科技文本时自动将被动句转为主动句(归化)，处理文学文本时尝试保留源语比喻(异化)，这种策略分化源于技术特性——归化利于信息快速传递，异化则需更高层次的语义理解。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中的“术语库”功能使异化翻译的术语统一效率提升 40%，而“风格模拟”技术则让归化翻译的文体一致性得到保障。但许渊冲在《翻译的艺术》中警示：“技术可辅助策略，却无法替代译者的文化判断”，如 AI 翻译“推敲”一词时，虽能异化保留“weighing words”，却难以传达“推”与“敲”的文学典故内涵(许渊冲，2006) [20] (见表 6)。

Table 6.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ontemporary era
表 6. 当代时期翻译策略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	代表实践/技术	策略倾向	核心影响因素	典型案例
21 世纪以来	“一带一路”翻译、AI 翻译	策略融合	全球化传播、技术条件、文化自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合翻译策略

6. 策略选择的解释性框架：多维制约因素

6.1. 社会权力结构的形塑作用

翻译策略与社会权力的互动关系在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古罗马时期的强势文化主导型归化，本

质上是通过语言转换实现对希腊文化的符号性占有,服务于罗马帝国的政治合法性建构。这种策略选择模式在 19 世纪殖民主义翻译实践中再次上演——英国对印度文学的翻译普遍采用归化策略,将本土文化文本改写为符合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叙事,从而消解殖民地文化的反抗意识(Venuti, 1995) [2]。在 19 世纪英美翻译实践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当时,英美等强势文化通过归化翻译,将弱势文化的文本改写为符合自身文化价值观的形式,在语言层面上消解了原文的异质性,使译文读者难以感受到原文所承载的文化独特性。这种翻译策略不仅在语言转换中强化了强势文化的叙事逻辑,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读者对弱势文化的认知,形成了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格局。

相反,当弱势文化面临强势文化冲击时,异化策略常被用作文化抵抗的工具。1919 年前后鲁迅倡导的“硬译”策略,表面上是语言形式的选择,实则是通过保留日语句法和概念结构,打破汉语传统表达惯性,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语言空间。这种“宁信而不顺”的激进主张,背后是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翻译重塑国民认知方式的文化战略(鲁迅, 2005) [17]。

6.2. 宗教传播的伦理制约

宗教翻译的策略选择始终受传播效果与教义纯粹性的双重制约。早期佛经翻译中的“格义”法,用道家概念“无”来阐释佛教“空”的思想,是典型的宗教归化策略,旨在降低中土士人对异质宗教的认知壁垒(谭载喜, 1991) [6]。而玄奘提出的“五不翻”原则,则建立了宗教术语的异化机制,对“般若”“菩提”等核心概念采用音译,以保持佛教教义的神圣性和准确性(王宏印, 2003) [21]。

基督教翻译史中同样存在类似的策略张力。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圣经》为适应拉丁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希伯来原文的诗学形式进行了系统性改写,这种归化策略极大促进了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而 16 世纪马丁·路德的德语圣经翻译则走了一条折中道路——既采用通俗德语进行归化以利民众理解,又保留了“因信称义”等核心教义的异化表达,形成宗教翻译的策略典范(Delisle & Woodsworth, 2012) [1]。

6.3. 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

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选择。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呈现典型的“实用主义归化”特征,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时,创造性地将“point”译为“点”、“line”译为“线”,通过概念的本土化再造,使西方几何学知识能迅速融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这种策略选择服务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用目标,暂时搁置了文化差异的深层讨论(陈福康, 2011) [22]。

而在学术知识体系转型时期,异化策略往往成为新知识引进的必要手段。晚清严复在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时,面临着汉语学术术语体系缺失的困境。他采用“译词创造 + 概念阐释”的复合策略,既通过异化手段创造“天演”“群学”等新术语,又通过译序和注释进行系统性阐释,从而构建起中国近代学术话语的基本框架。这种策略选择反映了知识范式转型期翻译活动的创造性功能(严复, 1981) [23]。

6.4. 译者主体性的历史觉醒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文化认同和诗学观念对策略选择产生直接影响。鸠摩罗什在翻译佛经时,既坚持“依实出华”的忠实原则,又承认“改梵为秦,失其藻蔚”的文化差异,这种辩证态度使其译本既能保持教义准确,又具有文学可读性。而林纾虽然不懂外文,却通过与人口译合作,将 180 余种西方小说译为文言,其策略选择深受桐城派古文观影响,形成了“意译为主、归化至上”的独特风格(孔慧怡, 2005) [24]。

20 世纪以来,译者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带来了策略选择的新维度。韦努蒂提出的“抵抗式翻译”理论,倡导译者通过异化策略揭示翻译的文化政治本质,这种理论自觉使翻译策略选择成为一种文化批判实践。

当代译者在处理后殖民文学时，常采用混合策略——在语言层面进行归化以保证可读性，在文化意象层面进行异化以保留反抗意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与历史语境的辩证互动(Venuti, 1995) [2]。

7. 结论

通过对中西方翻译史两千余年的编年考察，本论文揭示“归化”与“异化”策略的演变轨迹，本质上是人类文明互鉴历程的认知投射。从古代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与圣经翻译的神学调适，到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策略转型，再到数字时代的技术革新，翻译策略始终在权力结构、宗教伦理、知识生产与译者主体的历史合力中动态演进。这种历时性考察印证：翻译策略绝非单纯的语言技术，而是文明对话中文化身份建构的历史符号。

历史脉络凝练四大演进规律：其一，权力关系塑造策略选择深层肌理。强势文化通过归化实施文化吸纳(如古罗马拉丁化希腊典籍)，弱势文化则借异化守护文化根脉(如鲁迅“硬译”)。其二，宗教传播催生独特范式。玄奘“五不翻”守护佛典神圣性，哲罗姆平衡圣经“神圣性”与“可读性”，共释宗教翻译的永恒辩证。其三，知识生产驱动策略创新。《几何原本》的实用归化实现科技本土化，严复的创造性异化建构现代学术话语。其四，译者主体性觉醒赋予策略文化政治维度。从鸠摩罗什“依实出华”到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译者从“隐身人”转变为文化立场的言说者。

两千年翻译史印证，“归化”与“异化”之争是文明在差异中寻求理解的认知史缩影。其终极启示在于：在文明交流中，历史既是行囊也是灯塔，唯有背负其智慧，方能让翻译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图谱。

参考文献

- [1] Delisle, J. and Woodsworth, J. (2012)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ttps://doi.org/10.1075/btl.101>
- [2]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 [3] Bassnett, S. and Lefevere, A.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Pinter.
- [4] Benjamin, W. (1968)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Arendt, H., Ed., *Illuminations*, Schocken Books, 69-82.
- [5] Nida, E.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E. J.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95746>
- [6] 谭载喜. 中国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7] 王宏志. 重释“信达雅”: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8] 郭建中. 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 2000(4): 3-9.
- [9]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 从归化趋向异化[J]. 中国翻译, 2002, 23(1): 40-44.
- [10] 谢天振.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 [11] Augustine, A. (2012) *On Christian Doctrine*. Translated by D. W. Robertson Jr., Bobbs-Merrill.
- [12]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 [13] Luther, M. (1992) On Translation. In: Schulte, R. and Biguenet, J.,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1-75.
- [14] Dryden, J. (1968) Preface to Ovid's Epistles. In: Norton, D.F.,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1, Norton, 1840-1845.
- [15] Schleiermacher, F. (2012)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In: 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3rd Edition, Routledge, 43-63.
- [16] 钱钟书. 管锥编(第3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7] 鲁迅. 鲁迅全集(第6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8] 林语堂. 论翻译[M]. 上海: 光华书局, 1932: 1-28.

- [19] 叶朗, 朱良志. 中国文化读本(英文版)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20]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 [21]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 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22]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版)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23] 严复. 天演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24] 孔慧怡. 翻译·文学·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